

#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420)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 2000 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儒家伦理 基德 荣格 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07)04-0003-05

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是 2500 多年前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其道德伦理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理论体系。历经 2000 多年的演化发展和不断完善,儒家的道德观已经成为中国独特的道德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的儒家伦理的“基德”或“母德”。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在国际上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儒家学说体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思想贯通和理论整合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和荣格关于人性善恶的道德观心心相通的。也可以说,儒家伦理和荣格的道德观是一种机缘巧合(synchronicity)。

## 1 百家争鸣、独树一帜的儒家道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导致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的百家争鸣。在道德伦理问题上,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兵、农、名、杂等诸家学派都曾阐述过自己丰富的道德思想。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影响最大。但是,为什么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在中国社会长期坚持下去,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民主争鸣文化的传统特色呢?从汉代开始,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统治中国传统思想达 2000 多年的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呢?通过对儒家道德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不难看到儒家道德观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善恶本质的某种内在联系。

孔丘是最早使用“儒”这个概念并且实现了从儒士向儒家转变的人。孔丘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sup>[1]</sup>从孔丘的家学渊源来看,孔丘的祖先从商代一直到周代世代与儒沾边,就是孔丘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sup>[2]</sup>因此,孔子青少年时代也是一个儒士。但孔子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介

儒士,他立志要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远大的志向,实现其儒家治国的伟大理想。于是,从青壮年时候开始,他就通过私人讲学和游说,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正如荣格学者埃利希·诺伊曼所说:“个体必须先解决自己基本的道德问题,才能够在集体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sup>[3]</sup>孔丘正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才实现了从儒士向儒家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使命和身份的改变。它使儒者从一般意义上的术士之儒,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侠义的儒,其使命就是“积极干政,教化天下。”其次,活动方式和生存形式的改变。它对六艺的继承和发扬,使儒士不再只是为人养生送死的相礼职业,而是成为以其道德文章立于天下的君子。最后,历史地位的改变。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成为先秦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德价值观之一,甚至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达 2000 多年的文化传统。

孔丘的儒家思想内容丰富,这里简要阐述其道德观念的价值内涵。

### 1.1 忠恕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

儒家学说是以克己复礼起家的,因此,它把在人际交往中为人真诚、待人宽恕作为基本的礼仪要求和道德修养准则。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sup>[4]</sup>体现的就是待人真诚之意。而“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之于人。”<sup>[5]</sup>则体现的是儒家的“恕”。西方的炼金术士对“沉思”下的定义是“与自己的善良天使所进行的内心对话”。显然,这种内心对话就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而真诚

忠恕的待人之道则类似于荣格的个性化。

### 1.2 义利之辩是儒家的道德评价标准

孔丘是以个体对义利的追求来区分道德是非的。他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6]</sup>就鲜明地体现了人的道德精神的崇高追求。当然,孔子所反对的是无原则地追求不义之利,而不是一概反对追求必要的物质利益。他明确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sup>[7]</sup>因此,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君子要“见利思义”。显然,孔子是承认人性中有善也有恶的,这和荣格承认集体潜意识中有善恶的原型是一致的。只不过在面对善恶的两难选择时,荣格通过人性的整合来实现道德的个性化,而孔子则强调以“义”为基础的“利”。

### 1.3 智、仁、勇是儒家的基本美德

和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也确立了有道德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美德。他说,作为君子,应该具备三种美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sup>[8]</sup>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具备这三种美德的。然而,智、仁、勇又是人类共同的美德,是从众人的品德中抽取出来的最理想的人格特质。三者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是相互作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类共有的理想人格和荣格所谓的原型是有一致之处的。因为“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sup>[9]</sup>既然智仁勇三者是君子之德,而君子又是人类“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美德的集中体现者,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德就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原型。孔子还进一步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智是仁的前提、仁是智的核心,而勇则是智仁的外部表现。孔子说:“仁者安人、知者利仁”<sup>[10]</sup>就阐述了智和仁的不同作用。他所谓“择不处仁,焉得知”<sup>[11]</sup>的观点则阐明了仁是智的先决条件和目的。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sup>[12]</sup>则表明勇气是仁和智的外部表现。实际上,仁、智、勇三美德进一步发展了《易经》所谓“谦谦君子”的观点,并使之成为儒家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

## 2 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道德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实施了严酷的法制政策。这是和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崇尚通过以法治国来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传统分不开的。例如,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商鞅变法十几年,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

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sup>[13]</sup>这对先秦时期秦国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曾一度客于秦的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法家思想同样极大地影响了秦国的统治思想和政策。到秦始皇 34 年~35 年,禁私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政策的实施,使秦朝的法治思想达到了颠峰,也意味着秦始皇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这是因为,法制毕竟是外在的他律和压抑作用,它只能使人性中的恶暂时地躲避到潜意识之中。只有运用道德的力量,才能发挥道德自律的长久作用。

秦朝法治思想和政策的失败,引起了汉朝统治者的警惕。为了更持久地维护其封建“大一统”的统治,汉朝的统治者对各家学派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政策,因此,在汉朝初年,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登基时,汉朝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社会局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以推崇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确定为正统的政治指导思想,从此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是以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为主体,吸收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的学说,结合神学的目的论思想,提出了系统的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他说:“王者欲有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sup>[14]</sup>在这里,董仲舒用“天道”推演出“人道”,把仁政德治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本原则。他提出的“三纲五常”成为自汉朝以来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他的“重义轻利”、“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和“必仁且智”的道德观成为个体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两汉时期的统治者以及后来历代的统治者,正是看到了这种儒家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教化作用,才极力推崇儒家的思想。在封建时代,上至君王百官,下至普通百姓,都要自觉学习和实践儒家的道德思想。通过对“天道”和“人道”关系的理解,来遵循名教纲常的道德体系,以达到“张其纲纪,谨其教化”的治国目的。

但是,对儒家思想的过分推崇却也导致了一元化的集权统治,使精神的对立面不能得到正确的表现。正如诺伊曼所说:“一元论试图取消群集道德问题的对立面原则,并把两极中的一极提升到绝对的地位。”<sup>[15]</sup>这和强调法治一样,这种做法同样是把黑暗和阴影关在门外,因而仍然会陷入回避邪恶的意识危机。汉代末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就是这种

危机的反映。

### 3 兼收并蓄、对立融合的道德文化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处于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乱世”时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转移、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教育变革,适合封建门阀士族统治需要的“玄学”思想开始出现,主张用《周易》、《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来改造和解释儒家学说,在道德观念上也出现了由对立走向融合的文化趋向。

玄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劭、何晏、王弼、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根据当时时代对各种人才提出的道德要求,提出了各自的道德心理学思想。例如,刘劭不仅意识到个体在气质、性格等方面存在的心理差异,而且阐释了个体在形成道德品质方面的个性心理。他说:“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sup>[16]</sup>这里的中庸就是指,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能够和谐地发展。他还说:“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sup>[17]</sup>显然,刘劭的玄学思想既推崇圣人的道德才智,又带有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色彩。王弼进一步分析了人的自然本性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指出,人性“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取其共是无善无恶,则同也;有浓有薄,则异也,虽异而未相远,故曰近也。”<sup>[18]</sup>他看到了人的先天遗传因素有“浓”和“薄”的不同,认识到人性中存在着善恶的差别,这是相当宝贵的道德心理学思想。王弼也运用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德”的获得,他认为:“德,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这是因为“与天地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无穷极虚无也。”这种“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构成了玄学思想的道德心理学基础。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原型在很多方面和王弼的思想是一致的。

虽然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社会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多种观点并存的现象,但儒家学说仍然是占据主流的统治思想。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学说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傅玄、刘勰、刘昼、颜之推等人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傅玄提出了德威相济的理想道德教育的论点,认为“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这里的“正德”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范畴,其中的“义”是当时儒家理想道德的首要内容。

刘昼则根据时代的特点,以儒家的“五性”为基础,阐述了“顺德修善”、“戒盈慎言”、“防微杜渐”等个体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原则。颜之推继承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提出了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观。他明确指出:“孝为百行之首,犹需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他的《颜氏家训》也成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典籍。

除了儒家和道家的道德教育心理学思想之外,佛教的道德观也逐渐成为此后中国社会重要的道德文化传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我国对佛经的翻译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以中国学者为首的佛教理论家。尤其是隋唐时代,佛教成为风靡天下的国教。佛教的道德观也逐渐从向外求佛的传统教义转向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以求得心灵的解脱。荣格关于中年期心理危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这种由外烁转向内求的佛教思想的西方表现形式。在中国,从东晋时期的慧远到隋唐时期的天台宗和禅宗,体现了佛教道德观的承继和价值转换。总之,在这段为时长达近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道德教育心理学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演进和改变,形成了以儒、道、佛三家为主的思想论争和对立融合的思想格局。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吸收和借鉴,在思想和方法上兼收并蓄,相互融通,使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思想日臻完善。

### 4 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性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合导致了中国古代宋明理学的出现,因而在道德思想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融通的特点。宋代初年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开了中国古代理学思想的先河。如胡瑗的道德教育注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化。“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石介提出的“文以载道”、“教以传道”的思想,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教育的目的论和道德修养的立身之本。司马光进一步发展了宋代早期的理学思想,系统阐述了道德修养必须经历厉行、养德和入道这三个基本过程。他提出以“扞御外物”和“毋有意于善”的观点来解释理学的“格物”,主张人的为善应该是一种高度自律的道德境界,这种观点对后来理学家提倡克制“人欲”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后来周敦颐和张载的濂学教育思想把这种早期理学加以发扬光大,为后世道德教育体系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例如,周敦颐强调道德教育是对“圣人”人格的追求,旨在使人“道德有于身”。这种“圣人”人格的基础是“诚”,但这种“诚”已经超越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诚,他认为:“大哉乾元,万物

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矣。’显然，这里的‘诚’是一种无私、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德形而上学规定。要达到这种至诚的境界，就需要通过‘主静与慎动’、‘窒欲’、‘善学’等道德修养方法，来培养个体的道德品格，这种道德观成为宋明理学重视‘主敬’、‘主静’和‘克己’思想的来源之一。荣格曾指出：‘善与恶是我们进行伦理判断所依据的原则，但如果还原到本体论的根源，它们却只是‘开端’，是上帝的不同侧面和不同的名称。’<sup>[19]</sup>这种道德观和周敦颐的‘至诚’的道德境界何其相似。一个人只有怀着对神圣的至诚意义的信任；任由自己被它压倒，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同样，张载提出的道德行为是尊‘天道’，顺应‘天地之性’的观点成为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的直接思想来源。）

在宋明理学的四大流派中，程颢和程颐的地位仅次于周敦颐和张载的濂学，但是，在道德观念上，他们的思想却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理学的思想内容。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他们承认“性善论”，而“善”就在于“性”与“道”的合一，因此：“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sup>[20]</sup>“性”和“道”的这种统一，使传统的“性善论”获得了逻辑的理论根据，也为个体的道德发展提供了理学的依据。他们认为，虽然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价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道德判断不同所致。因此：“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sup>[21]</sup>就是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之才，贤人为学而知之之才，常人为困而知之才，愚人为自暴自弃之才。所以，道德教育不是去改变人性，而是改变使人性发挥作用的“才”。以这种基本的理学观点为基础，二程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原理，把道德教育心理学思想与本体论、认识论融为一体。他们把道德价值的准则确定为合乎“天理”，而不是出于“人欲”。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冲突，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就必须以“圣人”人格作为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圣人”人格体现在个体的内心就是一种道德完满的境界，其主要特点就是“克己”、“主敬”和“存诚”。荣格明确表示赞同东方人的这种道德态度，因为他说：“任何人如果同时觉察到自己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他就是在同时从两面看自己，并因而能够把握住中道。”<sup>[22]</sup>有了这样的道德理学存于心中，人的一切行为就必然具有了道德价值。

南宋时期的朱熹使理学思想达到了其历史发展的高峰。朱熹把“明人伦”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就

是说，要通过认识和践履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道德，把人培养成为自觉服从封建伦理道德的人。但是，“明人伦”不能仅限于此，其终极目的是培养一种“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圣贤人格。前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自得之乐，后者是符合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要实现圣贤人格，需要通过两种道德修养方式，即道德认识和道德践履。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朱熹明确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sup>[23]</sup>显然，从道德发展的顺序上，朱熹是认为“知先于行”的，因此，他根据这个特点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顺序，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进而又提出了“博约相济、积累渐进、日用切己、温故知新”的道德修养原则。形成了儒家道德理学观思辨的理论体系。

到明代初年，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得以确立，这是因为理学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传统的儒学，尽管理学思想也是从儒家学说发展而来的。南宋时期虽然出现了朱熹这样的大理学家，但南宋的统治者却没有重视朱熹的理学思想，甚至称之为“伪学”。从元代仁宗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到明代永乐年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重新修订，才真正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明代的理学家薛 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提出了“实得而力践之”和“下学人事，上达天理”的道德修养原则，进一步强调了道德实践的作用。另一位理学家吴与弼则把朱熹的理学思想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相结合，把从先秦时期到宋代的儒家学说都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圣贤之学，主张要“学为圣贤”。其主要方法是：“学圣人无他法，求诸己而已。”因此，他认为“欲到大贤地，须循下学工。文章深讲贯，道德细磨砢。”显然，这种“静观涵养”和“洗心”、“磨心”的道德修养方式，是理学和心学的一种独特结合。

## 5 反封建礼教、求义利人欲的道德批判

进入明末清初，社会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西方的文化渗透和经济入侵也导致了西学的输入。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观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学的某些思想，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对统治中国千百年的儒学经典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冲击。

在道德伦理问题上,他们把道德与功利、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李贽认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这是因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在习性问题上,王夫之反对“习性”善的主张,认为习性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在天理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在主张“欲生理”的同时,又强调“理节欲”的作用,认为“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废。”因此应该“顺其道”,使理欲“不相悖害,合两而互为体”,这样才能达到“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目的。后来的戴震更是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程朱理学的先天道德学说,因而强调“道即人伦之用”。在这里还有天道和人道之分“天道”是万物之“理”,而“人道”是“人之理”。因此“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其自然而已矣。”

显然,这些观点都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打击了崇尚“圣人”、“天道”的理学观点中的道德“权威”,使道德教育从圣人之学转向人伦日用之学,出现了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思想趋势。正如荣格所说“我只有通过它们双方的沉思,把自己从它们中解放出来,才能驾驭它们的极性,到达中观之地。而只有在那里,我才不再处在这对立双方的掌握之中。”<sup>[24]</sup>这里的对立双方既是黑暗和光明的对立,也应该理解为圣人之学和人伦日用之学的对立双方。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真正的道德教育就应该是对这种对立双方的正确解读,因为道德人格也是在这种对立双方的正确辨析中得到提升的。

参考文献

- 1 《论语·雍也》(6:13).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76.
- 2 《论语·子罕》(9:6).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118.
- 3 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高宪田,黄水乞,译.东方出版社,1998.11.
- 4 《论语·学而》(1:4).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2.
- 5 《中庸》(13:2).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12.
- 6 《论语·里仁》(4:12).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48.
- 7 《论语·里仁》(4:4).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42-44.
- 8 《论语·子罕》(9:2).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130.
- 9 Jung C.G. Instinct and Unconsciousness. CW.8.
- 10 《论语·里仁》(4:2).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42.
- 11 《论语·里仁》(4:1). 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42.
- 12 《论语·卫灵公》(15:9),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238.
- 13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8.
- 14 《汉书·董仲舒传》.
- 15 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高宪田,黄水乞,译.东方出版社,1998.67.
- 16 刘劭.《人物志·九征》.
- 17 刘劭.《人物志·流业》.
- 18 王弼.《论语释疑·阳货》.
- 19 Jung C.G. The good and evil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CW.10.
- 20 《遗书》.第1卷.《二程集》.校点本.中华书局,1981.1.
- 21 《遗书》.第22卷.《二程集》.校点本.中华书局,1981.291.
- 22 Jung C.G. The good and evil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CW.10.
- 23 《朱子语类》.第9卷.
- 24 Jung C.G. The good and evil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CW.10.

Basic Morality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Jung's Moral Ideas

Yang Shaog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As the main stream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ethics has established its “basic morality” or “mother mora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The Confucianism that flies its own color was formed through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hen Dong Zhongshu made his suggestion that restrained all the other schools but only respected Confucianism in Han Dynast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was established in Chinese society. By virtue of incorporating things of diverse nature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in the later dynasties,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as developed which made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into a confluence 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at criticized Confucianist thought would promote us to make a timely reflection of the Confucianist ethics.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provides us with a special angle of research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moral ideas between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Confucian ethics; basic morality; Jung's moral ideas